

中山大学学术丛书
——社会科学系列



台山侨乡 与新宁铁路

郑德华 成露西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中山大学学术丛书
——社会科学系列



台山侨乡 与新宁铁路

郑德华 成露西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此书出版，承陈国平先生、香港台山商会、旅港台山陈氏家族联合会资助，特此鸣谢。

作者

目 录

序

第一章 台山地理历史概述	(1)
第二章 台山侨乡社会的形成	(13)
第三章 孕育新宁铁路的社会因素	(28)
第四章 陈宜禧和新宁铁路的筹建	(34)
第五章 初期铁路资本的分析	(43)
第六章 铁路的修筑与扩展	(49)
第七章 组织及管理机构	(60)
第八章 惨淡经营三十年	(68)
第九章 新宁铁路对台山社会的影响	(87)
余 论	(100)

参考文献

一、方志、族谱	(105)
二、一般历史文献	(106)
三、著作、论文	(108)
四、新宁铁路有关文件	(111)
五、《新宁杂志》中有关新宁铁路资料	(115)
六、《中西日报》中有关新宁铁路资料	(118)
七、英文资料	(124)

附 录

一、余灼：《倡建宁城新昌冲菱斗山三夹铁路小引》	(134)
二、《商部奏绅商筹办新宁铁路拟准先行立案折》	(135)

三、《商部奏核订新宁铁路章程折》	(137)
四、《开设铜鼓商埠简章》	(142)
五、家 谱	(144)
六、广东省馆藏1949年前台山出版的杂志族刊目录	(146)
七、现存1909~1949年《新宁杂志》目录	(156)
八、英文档案资料	(157)
九、图片资料	(197)

序

在国内外，许多人都知道广东台山县是著名的华侨之乡，但长期以来，却没有一本关于它如何形成侨乡的著作出现，不仅台山如此，其他东南沿海的侨乡亦然。陈达于五十多年前写的《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成了研究侨乡的稀有之作，这充分说明侨乡史研究的贫乏。

1979年，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组织了一个台山研究联合调查小组，开始了我与社会学教授成露西的合作研究。当时是“四人帮”倒台不久的年代，海外华人史（包括侨乡史）的研究寥若星辰，困难重重。但是严冬已过，春色在前，一种探求新领域的精神鼓励我们投入这项研究工作。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台山地区保存在民间的许多珍贵历史资料大都已经散失，幸得当地政府把相当一部分地方文献保存在县公安局（后来已转交县档案馆），才使这项研究有了基本的素材。

为了弥补文献的不足，调查小组访问了二百多户侨属，召开了二十多场类型不同的座谈会。口头历史丰富了我们对于台山近、现代史的认识，而保存在他们家中的照片和从美国带回来的金山箱、咖啡壶、吊灯、铁锤等等实物，又形象地反映出台山人与美国华人社会千丝万缕的关系以及他们所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在台山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我们进而在广东四邑、广州、香港、美国三藩市、洛杉矶、西雅图、纽约等地广泛收集资料，并

于1985年底完成初稿的写作。

在该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们力图以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早期台山侨乡的形成、发展以及新宁铁路的兴衰为线索，探讨台山地区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历史原因，剖析台山与海外华人社会的关系；海外华人资本在旧中国的历史命运；表彰以陈宜禧为代表的爱国归侨对家乡建设所作的巨大贡献。

台山侨乡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对它的探讨，不仅涉及到晚清广东地方史的研究，而且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变化，海外移民运动，海外华人社会对家乡的影响等课题直接相关。而新宁铁路，作为旧中国为数不多的民族资本兴建的铁路，它的出现，印记着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人振兴中华民族的殷切期望和不懈努力的年代年轮，我们把这两方面的历史交织在一起写，目的是想让人们了解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可以说，没有台山侨乡的形成，就没有新宁铁路，而新宁铁路的建成，又深刻地影响了台山社会。

我们在本书的第四章，着重写了新宁铁路的第一任总理陈宜禧先生。他是一位爱国归侨，幼年赴美，在美国生活了四十多年，在华人社会中享有一定威望，60岁的时候，毅然返故里，献其暮年余力，主持修筑了新宁铁路。他的一生为美国和中国两个社会都作过贡献，赢得人们的崇敬，完全是实至名归。

若拿本世纪初台山与广东省其他非侨乡比较，其商业贸易繁荣得多，人民的生活水平高得多。但是，我们并不是以欣赏的笔调来写这段历史的，因为台山地区因侨汇而带来的繁荣，潜伏着许多社会危机，而最主要的问题是它并没有刺激当地生产力向前发展。历史应是一面镜子，我们剖析旧中国台山侨乡的社会问题，希望的是能为建设今日新侨乡提供一点历史借鉴。

在本书即将付印的时候，我们特别怀念已故的前中山大学校长李嘉人先生。他生前一直关心这项研究。他生平最后一次讲

话，就是为我们在台城召开的座谈会作的录音演说。

前任中山大学校长黄焕秋先生是一位慈祥而带长者风范的教育家，他常常把对海外华人史和侨乡史研究的独到见解，溶汇在侃侃的谈话中，使我们既感亲切，又受启发和教益。

谢谢两位前辈的关怀和教导。

借此书面世之机，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台山县各级领导、县侨办和六村侨委会的大力支持和协助；感谢曾在早期参加这项研究的刘玉遵副教授和梅缵月博士，还有为收集资料付出过劳动的余仁秋先生；感谢香港大学赵令扬、李鐸教授、刘泳聪博士，美国华人历史学家麦礼谦先生，三藩市州立大学谭雅伦教授，中山大学副校长胡守为教授，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张映秋所长从不同方面给予的帮助。

本书能顺利出版，还承香港华英昌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国平先生鼎力支持。在此谨向热心公益教育事业的陈先生及台山商会、旅港台陈氏家族联合会表示谢意。

我们谨把此书献给曾为台山和新宁铁路建设付出过努力的人；献给关心这项研究的朋友们。

郑德华

1989年8月于香港大学柏立基学院

第一章 台山地理历史概述

台山县位于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的西南方，东北与新会县接壤，西北与开平县相邻，西南与恩平县、阳江市相接，东南隔崖门口与斗门县、珠海市相望，南临南海，北部多丘陵，南部平原相对集中，是著名的侨乡。

台山县成为侨乡的原因是复杂的，了解它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概况，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台山县在辛亥革命以前称为新宁县，建县于明弘治十一年(1498)。在这以前，台山是新会县的一部分，隶属广东布政司广州府，因为这部分地区“负山阻海，盗贼频兴”，里排李祖田等，“请置县治，以便控制”。^①可见，台山县远在明代，就是一个社会问题较为复杂的地方。

该县面积3204平方公里。它的东北面有北峰山，东南面有南峰山，西南面有大隆山和紫罗山，南海中有上川和下川山。在北部和各河流之间，丘陵密布。计有玉怀丘陵、三合丘陵、朱洞丘陵、那西丘陵。全县的山地、丘陵约占全县面积的56%。

境内较大的平原是东南平原、海宴平原。南部和西南部的海滨地带，也有局部的小平原和临海的低原。概算平原的面积（包括滨海小平原、低地、盆地、丘陵间的局部平地等）约占全县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台山县山多，河也多。北部的河流有三条：台城河、白沙河和大江河，都向北流入边境大河潭江。南部较大的河流有：三夹

河和都斛河，其余的与西南部一样，有不少小河细涌，均向南径入南海。

县属的海岸线很曲折，只大陆海岸线就有 215 公里，其中有三个大海湾：崖门口、广海湾和北海湾。半岛有三个：赤溪半岛、海宴半岛和小江半岛，面积约 600 平方公里。海岛 74 个，其中上川、下川最大，大襟、洲、乌猪次之，总面积大约为 270 多平方公里。

台山的土地以红壤、石质土和冲积土最多，盐土、黄壤、沙土也有一些。

台山县土壤情况表

种类	分 布	面 积	占全县面积 %
红壤	北部和南部	146 万亩	35%
石质土	南部丘陵、山地和海岛	104 万亩	26%
冲积土	各平原、盆地、河谷及丘陵之间	128 万亩	31%
盐土	沿海低地	16 万亩	4%
黄壤	广海、端芬、附城等地的低中丘陵	6 万 4 千多亩	1.75%
沙土	海滨	2 万 1 千多亩	0.54%

资料来源：台山县志编写组：《台山县地理志》，（台山，1965 年，未刊稿，存台山档案馆）。

在本世纪 50 至 70 年代，台山县的耕地面积徘徊于 100 万亩至 120 万亩之间，约占全县土地面积的 21%。

台山县地处北温带（东经 112°8′至 113°3′，北纬 21°34′至 22°27′之间），属亚热带气候，高温多雨，一般适合水稻生长。②

概而言之，台山县属于一个海滨山地、丘陵地区，可耕面积不大，土质自然条件不算太好，因而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农产

台山（新宁）县明、清时期耕地面积表

年 份	耕 地 面 积
弘治十五年（1502）	2436 顷 67 亩
正德七年（1512）	2452 顷 67 亩
嘉靖元年（1522）	2530 顷 29 亩
隆庆六年（1572）	2455 顷 56 亩
万历十年（1582）	3427 顷 30 亩
万历二十八年（1600）	3427 顷 30 亩
天启二年（1622）	3545 顷 67 亩
崇祯五年（1632）	3427 顷 30 亩
顺治十四年（1657）	3545 顷 67 亩
乾隆三年（1738）	3715 顷 81 亩
道光十八年（1838）	3545 顷 67 亩

资料来源：《新宁县志》（光绪十九年〔1893〕本），《经政略》上，《田赋》。

区。县属范围虽有较长的海岸线，但由于在本世纪以前，内陆交通相当闭塞，更没有贯通南北的大河，所以虽有广海、铜鼓等天然港湾，在西人东渐的年代与外国人的接触也较早，但始终没有发展为一个对外贸易的集散地。③

县内的居民主要属于两大方言系统：广府话和客家话。④ 操广府话系统（又称台山话）的人一般迁来较早。据一般方志、族谱记载，这部分人原是北方人，后南迁至粤北，于南宋时期再由广东南雄珠玑巷迁至台山地区。此说虽未必可尽信，但他们的祖先来自五岭以北，在西晋至南宋时期取道梅岭南迁，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⑤ 这批居民由于来得较早，一般都占据了自然条件比较优越的地方。

而操客家方言的人迁入较晚，大部分是在雍、乾（1723～1795）年间从惠州、潮州、福建等地迁来。^⑥到咸丰年间（1851～1861），估计先后有30多万人。^⑦

客家人由于是后来者，所以一般居住在比较贫脊的地区，加上他们的祖先习惯居住于山区、丘陵地带，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也影响到这部分台山客家人的分布。^⑧

台山最早的居民应是蛮族的遗裔——瑶族人。^⑨估计在南宋以后，他们逐步迁向山区或与汉族同化。到了明代，被称为“山瑶”，^⑩而到晚清时期，台山地区的瑶族人已寥寥无几。这部分人后来亦逐渐与汉人同化，至今已不复作为一种少数民族存在。^⑪

台山人口在1954年为670150人，1963年为725976人。到80年代，人口增至接近100万。^⑫至于历史上的人口数目，目前仍难于准确考订，下面资料是根据地方志所载整理。（见下表）

只要我们把“台山（新宁）县明、清时期耕地面积表”与“台山县历代户、丁口统计表”作一比较，便可发现：

1.从万历（1573～1616）年间至道光（1821～1850）年间，该县的耕地面积基本上没有变化；而丁口，从弘治（1488～1505）年间至康熙（1662～1722）年间变化亦不大。

2.丁口的变化（从趋势来说，亦反映了人口的变化），是从雍正（1723～1735）以后开始的，到道光年间，丁口已约为顺治（1644～1661）末年的14倍。

虽然，清代人口统计数字的问题很多，并不能准确反映客观实际情况。如在康熙末年实行“摊丁入亩”后，新报的丁口数目一时骤增，反映了以前存在隐瞒丁口的情况。但是，我们仍然相信，清代中叶，台山县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人口的增长是比较迅速的。

除了人口增长外，在清代，有几件与台山县有直接关系的历

台山县历代户、丁口统计表

年 份	户 数	丁口数
弘治十五年（1502）	7612	23282
正德七年（1512）	7741	25497
嘉靖元年（1522）	7762	20870
隆兴元年（1567）	7840	16357
万历三十八年（1610）	7787	16502
天启二年（1622）	7850	18020
崇祯五年（1032）	7861	17970
顺治十四年（1657）	2995	13653 (12412)*
康熙元年（1662）		13738 (9287)*
康熙十一年（1672）		(14434)*
雍正九年（1731）		127323**
～嘉庆二十三年（1818）		
道光十八年（1838）		196971**

资料来源：《新宁县志》（光绪十九年〔1893〕本），卷11，《经政略》上，《户役》。

*《广州府户口考》，见《方輿汇编职方典》卷1307，《古今图书集成》第163册（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本）。

**戴肇辰等修，史澄、李光廷等总纂：《广州府志》（广州，粤秀书院，光绪五年〔1879〕本），卷70，《经政略》一。

史事件，对19世纪中、后期发生的海外移民浪潮及侨乡的形成，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清初迁海。

顺治十八年（1661）底，清政府为了防止沿海人民支持台湾

郑成功的反清斗争，决定在东南沿海五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实行迁徙政策。而广东，大部分地区是在康熙元年（1662）实施：

“诏濒海各县，居民内迁五十里”。^⑬

三年之后，又因番禺李荣起义，活动于沿海一带，政府继续把近海之民限日徙于内地。^⑭

“由是沿海居民牵牛担种，扶携老幼，哭声震天，山贼乘机劫掠，死亡满道矣。”^⑮

不仅被迁徙地区的人民蒙受灾难，就是未被迁徙的地区也不能幸免。

“……地迁矣，又存在设重兵以守其界内，立界之所筑墩台树桩栅，每年每月又用人工土木修整，动用之资不费公家，丝粟皆出之民力，未迁之民日苦派办……”^⑯

康熙七年（1668），康熙在群臣的奏议之下，同意“展复两迁地界”。但是，情况已不能复原，就台山地区来说，迁回去的只有十分之一二，有的甚至只有百分之一而已。如南部的海宴街，迁徙时有2300余人，复界时只有23人。^⑰

很明显，康熙年间的迁海事件给台山地区带来的直接影响是：社会动乱，经济受到破坏，人口减少。原来，人口与可耕地面积的分布基本成正比例，但是经迁徙后，南部可耕地多，但人口却稀少，北部可耕地少，人口分布却相对较多，这种不合理的人口分布，就是康熙迁海事件带来的直接恶果。

客家人入迁。

为了弥补迁海事件造成沿海地区的土地荒芜，广东的官吏多次请求朝廷“移民垦辟以实之”。于是，从雍正、乾隆年间起，惠、潮、福地区的客家人陆续有人迁到台山及邻近地区就耕。这就是客家迁移史上的第四次迁徙行动的一部分。^⑱

这些新迁来的“客民”一般到山林丘地开荒或在海边围田就

耕。从康熙二年（1663）至嘉庆十二年（1807）台山上报的新垦田数为4277顷60亩余，比原额田3545顷67亩还要多。^⑲这些新垦的田，大部分是新来的“客民”开垦的。

“红巾之乱”

咸丰四年（1854）五月，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爆发了“红巾之乱”。这次农民起义的矛头不仅指向清朝政府，也指向地方的地主乡绅，引起了这两股势力的进一步联合。^⑳

据《新宁县志》记载，台山县并不是红巾军起事的地点，但却在其活动范围之内，红巾军对台山较大规模的行动有三次，均为地方军队和乡绅组织的团练所击退。^㉑

“红巾之乱”对台山社会的主要影响是促使以宗族为核心的乡绅势力进一步膨胀。台山地区如广东其他地区一样，是一个聚族而居的地方。各地、各村的姓氏、房氏划分井然有序。这种宗族关系到了清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民重建祠，每千人之族祠十数所，小姓单家族人不满百者亦有祠。其曰大宗祠者，祖之庙也。”^㉒

除了建族祠之外，还“多置祭田”。它们名义上是乡族公有财产，实际上操纵在少数地主、豪绅手中。他们以族长、父老的名义控制着族产，干预族内一切事务，成为一群地方的实力派。

在咸丰四年的“红巾之乱”中，台山地区的宗族首领及乡绅不遗余力地协助当地的封建政权扑灭这股反封建势力，或是捐募乡勇，或是“率族人拒之”。在平息了这场农民起义之后，总督瑞麟大大感谢地方乡绅的协助：

“官民同心，团练得力，各乡绅士，或捐资募勇，帮同打仗”，或婴城固守，昼夜辛勤，不辞劳瘁，尤为急公好义，除俟仿剿……”^㉓

“团练”与“乡勇”是由乡绅组织起来的，而它的基础正是地方的宗族关系，所以，镇压红巾起义的过程，实际也就是宗

族势力的增长过程。这时的地方的宗族势力不仅有控制族人生活的功能，有自己的产业，而且还有附属的武装——团练、乡勇，一个乡或一个大的姓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在清王朝每况愈下的情况下，它们一方面承担着维系社会秩序和封建生产关系的作用，另一方面在某种条件下，又成为社会安定的破坏力量。“土客之争”就是其中一例。

“土客之争”。

咸丰五年（1865）至同治六年（1867）的“土客之争”是一场带着宗族、地方色彩的方言群械斗。爆发的主要原因是，随着雍乾年间人口的增加，台山地区人与土地的矛盾日趋尖锐，夺取土地和资源，成为地主、乡绅最关注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巨姓大族，凭着自己的势力，把“山海间区，尽为己有，畛域之见，牢不可破”，即使是官方“法令文告，终属虚文”。^①而此时，台山及邻近的客家人，亦逐步发展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与较早迁来的“土人”一样，有争取土地和资源的要求。在地区政府无法有效控制民众之间的矛盾的情况下，两种不同的方言群体之间的纠纷很快就从个别地方扩张为姓与姓、村与村，甚至跨县的械斗。

“土客之争”最初发生在鹤山、高明、开平、恩平等地，是“土人”和“客人”一些相斗事件。然而，新宁的地方官僚及乡绅却捕风捉影，扩大宣传，把祸水引来。下面是当时的知县饶继惠关于客人动态的“报告”：

“……曹冲匪首杨梓钊等，原有伙党二万余人，均系咸丰四年红匪滋事案内遗孽居多，复收集各处无业游民，及各省撤回散勇纷纷投入其中，声势颇为浩大……臣等伏查曹冲匪类，本与恩、开客匪迥不相同。恩、开情形系与土人械斗，因地方官办理不善，以致兵连祸结，积世成仇，而曹冲匪徒盘踞一隅，聚党裹胁，志在财帛，扰害乡民……”。^②

由此，关于“客人”要进攻“土人”的传闻越来越多，新宁县内的塘底、上泽、六堡、冲葵、潭溪、都斛、海宴设局招勇，严阵以待，一场土、客互相厮杀的惨剧不可避免地爆发。

这场械斗在新宁县延续了十二年。“凡土客互斗地方皆白骨遍野，骸骨成堆”，^③死于械斗或逃难，病故的人无法统计。如大窿洞一地，原住有客人三万余，因械斗村落被焚，结果只得就郊野支帐篷而居。至同治三年（1864年），因染流行疾病而死的超过二万人。在金鸡、赤水、深井、大窿洞、燕子角等地，都有土、客混杂的万人坑。据《赤溪县志》估计，光是因械斗逃亡的就不下十余万人，自卖或是被掳卖到南美洲的客人就有二三万人。^④

“土客之争”使台山地区的正常生产和社会活动受到严重的破坏，加速了这个地区小农经济体系的崩溃，破产的农民不断增加，而寻找活路，成为这批人急待解决的问题。

注 释

① “县治原割新会德行都14里，文章都10里，平康都1里，矮岗都14里，海宴都18里，潮居都2里，共59里，建县后开增共67里”。见王嵩修，陈份纂：《新宁县志》（嘉庆九年[1804]本），卷1，《地舆》。关于建县过程，参看何福海、郑守昌修，林国赓、黄荣熙纂：《新宁县志》（光绪十九年[1893]本），《纪事略》上。

② 上文有关台山县自然条件的资料来源，均见《台山县地理志》（未刊稿）。

③ 据中、西文献记载，在明代正德年间（1506—1521），西方殖民主义的急先锋葡萄牙人已开始在广东沿海活动。过去一段时间，不少学者曾认为葡萄牙人在广东贸易的第一据点（Tamão）是台山县的上川岛。虽然此说目前已为部分学者否定，但明代西方人曾在上川岛一带活动是无庸置疑的。1552年，方济各教士沙勿略（Francois Xavier）病逝在上川岛，而现在仍保存在上川岛的方济各教堂，相信与早期的葡萄牙人及罗马教庭亦有直接关系。参看：张增信：《十六世纪前期葡萄牙人在中国沿海的据

点》，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编辑委员会：《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二）（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1986年12月），第77—88页；萧致治、杨卫东：《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1517—1840），（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5月），《附考》·《传教士来华及其活动》，第11—12，35页；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4月），第163页；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笺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月），第52页。

④ 广府话、客家话均为广东省主要方言。广府话以广州地区的发音为准，客家话一般以梅县发音为准。

⑤ 台山县操广府话系统的人不少自称其祖先在南宋时期因胡妃事件，从粤北南雄珠玑巷迁来，这与广东其他地区部分居民的说法一样。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这种说法尚待进一步考究，但起码，它反映了南宋时期广东移民的一种趋势。参看黄慈博：《珠玑巷民族南迁记》（广东中山图书馆油印本，1957年）；罗香林：《粤民源流与体系》，《珠海学报》第5期（1972年1月），第53—66页，和《宋代南雄珠玑巷与民族迁移之关系》，《华冈学报》第8期（1974年7月），第173—196页；（新会）《李氏家谱》，《序》（1920年）；《南雄珠玑巷》、《胡妃事杂考》、《附录·珠玑巷考》，《南海大范张氏家谱》（1925年冬）；梁鼎等：《岭南移民考》，《侨巷开平梁族宗亲会梁姓族谱》（香港，1981年2月），第35—44页。陈乐素：《珠玑巷史事》，见张世泰、冯伟勋、倪俊明编：《馆藏广东族谱目录》（广州中山图书馆，1986年6月）。

⑥ 详见后文“土客之争”部分。

⑦ 王大鲁修，赖际熙纂：《赤溪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20年），第166页。

⑧ 关于客族人的生活习惯，参看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广东兴宁，希山书藏，1933年11月），《客家的分布及其自然环境》，第93—124页。

⑨ 参看罗香林：《粤民源流与体系》。

⑩ “新会西界，多有山獠”（按：当时新会的西界，后属新宁县），见谭德：《新会乡土志》（香港，华冈学会，1970年7月），《人类》，第77页。

⑪ 据宋桂楨、李鸿宾在道光十一年（1831）的奏稿：“查瑶黎所居山场，种植树木禾稻等项，本多无税官荒，民人不得藉端混行占垦……（见《新宁县志》[光绪十九年本]，卷11，《经政略》上），可知此时的瑶人，已迁至极荒芜的地区生活。而瑶人在清末与汉人同化的情况，参看《台山县地理志》，《居民》，第8页。

⑫ 《台山县地理志》，第10页。

⑬ 关于清初迁海事件，参看杜臻：《粤闽巡视纪略》（《四库全书》珍本4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卷1—3；王嵩修，陈份纂：《新宁县志》（嘉庆九年[1840]本），卷1，《风俗》；《新宁县志》（光绪十九年本），《事纪略》上；郑德华：《清初广东沿海迁徙及其社会影响》，《九州学刊》，第2卷4期（1988年），第47—71页。

⑭ 《赤溪县志》，164页。

⑮ 黄朝槐：《宁阳杂存》（广州，新宁明善社，光绪二十六年[1901]本），第7页。

⑯ 《王来任疏》，载《新宁县志》（光绪十九年本），卷14，《事纪略》下。

⑰ 李奕楫：《海宴乡土史》（九龙，永德印务社，1960年3月），第138页。

⑱ 参看《客家研究导论》，《客家的源流》，第61—62页；郑德华：《晚清以来客家研究述评》，《明清史集刊》1989年第2期，第96—123页。

⑲ 《广州府志》，卷70，《经政略》一。

⑳ 参看《广州府志》卷80，《前事略》六；J. Y. Wong, Yeh Ming-chen: Viceroy of Liang Kuang, 1852—185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 1976), pp. 94—119.

㉑ 第一次在咸丰四年七月中旬，地点是盭家山及谢边、上桥、坑尾等村；第二次在润七月尾，地点在茭荻嘴至谢边；第三次在八月初，地点在牛山嘴河、鲤鱼山河一带。参看《新宁县志》（光绪十九年本），卷14，《事纪略》下；赵天锡：《赵鲁庵先生集》（广东台山，浮石濬志书屋，1916年冬），卷8，《杂录》四，《杨侯守城录》。

㉒ 《新宁县志》（光绪十九年本），卷14，《事纪略》下。

②③②⑦ 《赤溪县志》，卷8，《附编·开县纪事》，第177页。

②④ 《赵鲁庵先生集》，卷7，《杂录》三，《新宁实业成绩》。

第二章 台山侨乡社会的形成

台山侨乡社会的形成时间大约在晚清光绪（1875~1908）初期，而要研究它的成因，必须了解19世纪中叶发生的一场海外移民运动。

中国南部与海外的交往由来已久，有文字记载的可以上溯至汉代。^①但是，直至明、清两代以前，中国海外移民虽然持续发生，但始终仍属少数。明朝与清朝（同治〔1862~1874〕年间以前），实行的是海禁政策，亦大大抑制了人民向海外移动的倾向。^②然而，随着明代中后期中国农村生产关系的变化，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逐步松弛，商品交换有所发展，人口流动的可能性相对增大，因而在18世纪，已有一部分南中国人在东南亚各地活动，其中包括台山人。^③

从清代海外移民运动的发展过程来看，在19世纪中叶以前仍属酝酿时期。在这个时期里，除少数人随着贸易交往移居海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这就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开始在东方掳掠人口和贩运契约劳工，^④而在广东首先建立的据点就是澳门。早在16世纪中期，就已有葡萄牙人从澳门运送中国人到其他海外殖民地作奴隶或劳工的记录。^⑤这部分人，相信是来自澳门邻近的县份，台山当然也包括在内。^⑥

虽然，西方殖民主义者这种早期掳掠人口和贩运契约劳工的行动并没有，也不可能刺激起一场海外移民运动，但却加强了这些地区的人民与海外的接触，并给了那些破产农民一个讯息：

出外谋生也是一种寻找活路的方式。而澳门（后来还有香港和汕头）与台山等地的密切交往也为日后苦力贸易的开展提供方便。

19世纪中叶在南中国爆发的海外移民运动是中外历史因素相结合的产物。

从国内来说，雍、乾以来生产力的发展与土地资源的开发，赶不上人口增加的速度导致出现人口相对过剩问题。而康熙末年实行的“摊丁入亩”，把税收与丁口的关系取消，客观上减弱了封建政府对人口流动的控制，^⑦加上道光年间以来频频发生的事件：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红巾之乱”、“土客之争”以及各地民间的械斗，使南中国陷于极度的混乱之中，小农大量破产，一支急于寻找活路的劳动大军迅速形成。

从国外来说，在19世纪初至19世纪40年代，经过反复斗争，西方殖民主义者不得不放弃奴隶贸易。^⑧但与此同时，南美洲经营的种植园出现了严重的劳工短缺危机，而美国加州和加拿大出现的淘金热，美国大陆铁路和加拿大境内铁路的修建，以及东南亚矿场、种植园的开发，都迫切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工。于是，西方资产阶级把目光转向东方，转向中国，力图以华工代替黑奴，填补其劳工的空缺。

上述两种因素在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殖民主义已敲开了中国沉睡的大门，在沿海的通商口岸建立了自己的立脚点而迅速结合，导致了南中国移民运动的爆发。

在这次南中国的海外移民浪潮中，台山县是重点地区之一。

19世纪中叶从台山到海外的移民，除少数商人、小贩之外，绝大部分是青壮年农民。“自红匪、客匪构乱后，适洋务大兴，壮者辄走外国，四野芜积”。^⑨他们有的在械斗中被俘，被卖往澳门、香港的猪仔馆，然后再转送到太平洋彼岸做苦工；有的到港、澳或珠江三角洲一带行商访友，被掳掠出洋；^⑩有的则因为

某种政治原因，如参加“三点会”被迫逃亡海外；^⑪而相当部分则是因为生计，到海外寻找出路的破产农民。

据清光绪二年（1876）赴美参观世界博览会的李圭记载，当时加入美国宁阳会馆的华人达75000多人，加上未参加宁阳会馆的人数当在80000人以上，约占美国华人总数的一半，^⑫到清光绪二十六年（1901），台山旅美华人已达120000人，^⑬如果加上当时侨居美洲其他国家和东南亚地区的，台山华人估计有20万之众。^⑭很明显，这批台山海外移民只是19世纪南中国移民浪潮的一部分，其特点是移居地以美洲为主，绝大部分是社会

1868年美国加州华工职业情况

商 販	2000
自營工厂	2000
其 他	1000
房屋清洁工	1800
城镇劳工	3500
技 工	1000
佣工	3000
太平洋铁路劳工	10000
矿 工	13000
农业工	2000
渔 民	200
总 数	39584

资料来源：Cleveland to Browne, 27 July 1868, p. 531, 引自 Shih-Shar Henry Tsai, *China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1868~1911*, (Fayetteville,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 1983), p. 21.

下层的劳工，他们在同治年间以前，并没有构成对台山经济、社会以显著的影响。

然而，到了1882年美国排华法案公布之后，情况起了变化：

“我邑自美人设禁以来，此20余年间，出洋者大都商家子弟，其父兄亲属之久旅于彼者，而一般农民及苦力之家则望尘不及……”^⑩

一方面由于台山海外移民成份结构的变化，商人成份增多，^⑪另一方面也由于早期的贫苦移民在经过二三十年的辛勤积累之后，多少有了一点积蓄，所以到了光绪（1875~1907年）初年，台山海外华人已形成了一股对家乡经济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力量。

台山海外华人对家乡在经济上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三个因素。

第一是回归心理。19世纪中后期的台山海外移民与其他地区的一样，以男性单身汉为主。

美国华人性别人数及比例

（1860~1910）

年份	总数	男性	女性	男女比率
1860	34933	33149	1784	18.6:1
1870	63199	58633	4566	12.8:1
1880	105465	10068	4779	21.1:1
1890	107488	103620	3868	26.8:1
1900	89863	85341	4522	18.9:1
1910	71531	66856	4675	14.3:1

资料来源：Diane Mei Lin Mork and Ginger Chih, *A Place Called Chinese America*, (Dubugwe, Iowa: Kendall/Hunt Publishing Co., 1982).

他们到外国谋生，主要是为了生计，为了改变自身或家庭的经济状况，“衣锦还乡”是他们最大的理想，而被卖到海外的“猪仔华工”，也同样抱着有朝一日，荣返故里的心态，所以无论上、中、下阶层的移民与家乡在经济上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第二是地缘和血缘的关系纽带。儒家文化的传统一向注重家族、家庭的血缘关系。明、清之际地方宗族势力的膨胀，使这种传统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强。它反映在19世纪中、后期的海外华人社会中，就是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核心的会馆，成为一种组织和领导的力量。会馆不仅有团结当地华人的功能，而且有联系家乡的功能。它们在促进海外华人支持和改进家乡的经济状况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三是由于当时的种种历史条件，造成海外华人社会有某种封闭性，这种封闭性相对稳固了海外华人与家乡的联系，并为他们个人经济上的积聚创造了环境。

海外华人对家乡的影响力，在19世纪70年代逐步显示出来。

“自同治以来，出洋之人日多获资回华，营造屋宇，焕然一新。”^⑫这时的台山地区，已不同于广东一般地区而具有侨乡的特色了。

一、侨汇或侨资成为维持和发展当地经济的重要支柱。

二、侨户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在经济上较为优越，但却没有政治权力。

三、消费性较强，所谓“民风渐入奢靡，冠婚之费，动辄数百金”。^⑬

据台山有关历史文献记载，在19世纪中叶以前，台山地区的粮食基本上能自给，但到19世纪末，不仅粮食生产，而且其他农业和小手工业的生产都处于一种下降的趋势。当时一位本地的举人赵天锡曾对这作了一个较为详细的调查。

19世纪末新宁耕地状况

上则税田	0 亩
中则税田	142806.631亩
下则税田	123814.817亩
原斥卤田	36210.1007亩
科斥卤田	11395.44亩
新斥税田	111743.57917亩
香斥税田	14849.01168亩
共	440819.57995亩

资料来源：《赵鲁庵先生集》，卷7，《杂录》三，《新宁实业成绩》。

其中较肥沃的是中则、下则税田，共266621.44亩，约占总数的60%；原斥、科斥卤田，新斥、香斥税田是山头岭角之地，非砂石夹杂则黄土凝结，十分瘦瘠，占总数的40%。全县的田其中400顷种杂粮，4000顷种水稻。

19世纪末新宁县从事农业、非农业人口比例：士工商杂民兼农业的占 $\frac{3}{6}$ ，士工商不兼农业的占 $\frac{2}{6}$ ，专门从事农业的人口占 $\frac{1}{6}$ 。

（引自《赵鲁庵先生集》，卷7，《杂录》三，《新宁实业成绩》）

专门从事农业的家庭，若以五口为一户计算（一正丁，一余丁，三妇女老少，耕牛一头），约耕1000平方丈（等于16.67亩，而兼农业者平均每户约耕375平方丈（等于6.25亩）。

县内水稻的产量很不均衡，产量高的每年每亩可达1200斤，等于平均产量的5倍，而低产的只有几十斤，全县水稻的总产量为10900万斤。

19世纪末新宁县用粮情况

类别	人数	每年用粮（谷）	其他杂粮
专农业	10万	2000万斤	占50%
兼农业	30万	10800万斤	占10%
非农业	20万 （其中10万食于外）	4000万斤	
共用粮		16800万斤	

资料来源：《赵鲁庵先生集》，卷7，《杂录》三，《新宁实业成绩》。

很显然，台山地区从事农业生产人数（专业、半专业）占总人数的 $\frac{1}{2}$ ，但是仍然不能供给本县的需要。全县粮食“仅支半年，余日则仰给洋米，倘舟楫偶断，炊烟立断”。^⑨每年花在购买粮食上的钱118万两银，这确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

除了农业之外，农产制品、手工业品生产也处于一种下降的趋势。

19世纪末新宁主要农产制品生产状况

品 种	过去及现在生产状况
糖	原有制糖厂十余家，现只剩三家
花生油	原有十余家，现基本停止生产
酒	各墟镇约有生产，但不敷本县
靛	自种自制，零星收购
棉 布	买洋纱自织自用
夏 布	下新宁原年产麻布、粗布万余匹，行销县外，现剩1/10~2/10；上新宁原年产青纱布万余匹，现只产4/10~5/10

19世纪末新宁输出物资

品 种	输往地点、方法
夏布	由布商收买运往外地销售
谷	由海宴、都斛运往新会、江门等地销售
米	由获海、新昌加工运往新会等销售
茶	原横水产细茶、现已歇业
猪	间有运往新会销售
鸭	间有运往澳门、新会销售

19世纪末新宁输入物资

品 种	由何地输入
洋 米	香港等埠
石 油	香港为主
花生油	电白、水东为主
洋布、纱和各色布	香港、广州、佛山为主
糖	电白、水东为主
杉 木	南海、新会、阳江为主
竹 器	新会
鱼 脯	澳门
酱料杂食物	澳门、新会为主
酒	澳门、湛江为主
时果瓜菜	澳门、石岐、新会为主

资料来源：《赵鲁庵先生集》，卷7，《杂录》三，《新宁实业成绩》。

19世纪末台山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下降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与青壮年劳动力外流有关。据宣统（1909~1911）年间新宁知县覃寿堃调查，在大隆洞、那扶、狮子头、园山一带，住有一种“佃民”，此种佃民，均由信宜、阳江各地转徙而来，结寮而居，以赁耕为事，久者或十余年，或则往来不常。”^②他们实际上是台山地区的流动性雇佣劳动力。使用这种劳动力相对增大了农业的成本价格，贫苦的农户付不起这笔费用，有的宁愿把地丢荒或耕作粗一点，至使影响水稻的产量。

另外，由于有了侨汇的收入，使一部分人脱离或半脱离农业、手工业生产。如上文提到的夏布生产急剧衰落，就是由于侨属妇女的出现而造成的。相当一部分侨属家庭，男的出外洋，女的在家料理家务，她们“能樵耕者不及十之二三，其余则坐食而已”。^③这也是台山地区农业、手工业生产下降的另一重要原因。

虽然，19世纪末台山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处于下降的趋势，但生活水平却在上升。这主要是有侨汇的注入。这个时期侨汇对台山社会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促进商业发展。19世纪后半期台山的“金山庄”（钱庄）、金银铺、杂货店、布匹百货铺、酒楼饭店、建筑材料店纷纷出现，以商业为中心的新圩镇不断增加。在道光年间全县只有52个圩镇，到光绪十九年（1893）已增加至75个。^④

繁荣文化教育事业。1850年前，全县创办的旧式书院只有5间，而从1850~1911年这60余年时间，新创办的学校就有47间，为原来的9倍以上。

宣统元年（1909）新宁出现第一个学术团体——“新宁教育会”，出版了第一本杂志——《新宁杂志》，开创了台山办杂志和宣传民主思想的先河。^⑤

兴起办慈善事业的风气。“近年藉外洋之资，宣讲堂、育婴

1911年以前新宁县创办的学校一览表

创办时间	校名	地点
乾隆三十五年(1770)	宁阳书院	台城
	广海书院	广海镇
	文海书院	文村
	潭湖书院	莘村
嘉庆二十二年(1818)	琴溪书院	那琴圩
同治七年(1868)	遵义书院	赤溪
八年(1869)	清溪义学	田头村
	育秀义学	田头村
	文明义学	曹冲
	正义义学	曹冲
光绪三年(1877)	文渊义学	铜鼓
	崇正学社	赤溪
	观海义学	海宴
	康和书院	三合圩
五年(1879)	两峰书院	白沙
	江川书院	下川
	昇平义学	冲葵
	均和义学	海口
光绪十七年(1891)	瑞应书院	台城
光绪三十二年(1906)	瑞应小学	台城
	坑口小学	坑口

续表 1

创办时间	校名	地点
光绪三十三年(1907)	新昌小学	新昌
	培善小学	那西
	获海小学	获海
	浮石小学	浮石
光绪三十四年(1908)	成务小学	(?)
	下坪小学	坪山
	谭氏小堂	(?)
	广海高等小学堂	广海
宣统元年(1909)	广益高等小学堂	(?)
	爱群小学堂	顺安
	公益小学堂	水楼
	槎洲小学堂	槎洲
	竹湖小学堂	竹湖
	端芬小学堂	端芬
	有秋小学堂	都斛
	那金小学堂	那金
宣统二年(1910)	淑慎女学堂	台城
	育才小学堂	南昌
	明新小学堂	板潭
	达聪小学堂	南坑
	上坪小学堂	坪山